

占领历史研究

1931—1949

“1931—1949占领历史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 主编 胡德坤

■ 译校 胡焰初 等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31-1949 Proceedings

Editor-in-Chief
Professor Hu Dekun
Translated by
Professor Hu Yanchu, etc.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占领历史研究

1931-1949

“1931-1949占领历史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 主编 胡德坤

■ 译校 胡焰初 等

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

联合主办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联合承办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31-1949 Proceedings

Editor-in-Chief
Professor Hu Dekun
Translated by
Professor Hu Yanchu, etc.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uhan, China, April
14-16, 2008) Organized and Sponso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Wuhan
University through its School of History &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占领历史研究:1931~1949/胡德坤主编;胡焰初等译校.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2

“1931-1949 占领历史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ISBN 978-7-307-07528-3

I. 占… II. ①胡… ②胡…[等] III. 世界史—1931~1949—文集
IV. K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2634 号

责任编辑:聂勇军 罗晓华 责任校对:刘 欣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7.5 字数:634千字 插页:1

版次: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7528-3/K·442 定价:5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出版前言

这部由中外学者共同研究的论文集的出版来之不易。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简称“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后同）自1980年成立以来，研究者们就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加入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简称“国际二战史研究会”，后同），让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经过学会20余年的努力，终于与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取得了联系。

2005年7月3日至9日，国际历史学大会在悉尼召开，受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的邀请，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第一次派我和副会长徐蓝教授为代表参加了会议。7月8日上午，由国际二战史研究会主持的主题为“20世纪的种族主义和战争暴行”的分会场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生科大楼A厅召开。我发表了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化学战及战后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的演讲，用大量翔实的事实客观地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大地上实施的惨无人道的化学战及其对中国人民的戕害。7月9日上午，国际二战史研究会主席格哈德·赫尔施菲尔德（Gerhard Hirschfeld）教授宣布中国二战史研究会正式加入国际二战史研究会，拥有对全体大会上各项决议的表决权，中国终于成为国际二战史研究会的成员国。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副会长徐蓝教授在大会上汇报了中国对“二战”研究的情况，并向国际二战史研究会提交了《中国国家报告》。在本次会议上，我还向格哈德·赫尔施菲尔德主席口头提出了近年内在中国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建议。

2006年1月，格哈德·赫尔施菲尔德主席的来信中，向我通报了国际二战史研究会将于3月底在巴黎召开理事会，讨论下一届国际会议的举办事宜。我向武汉大学汇报了这一情况，建议武汉大学申请作为承办单位，得到学校的支持，便由武汉大学国际交流部给国际二战史研究会发去了正式函件，表达了希望下一届国际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的愿望。2006年5月，中国二战史研究会收到国际二战史研究会的正式回复，决定下一届国际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至此，本次国际学术会议开始进入筹备阶段。7月，武汉大学各部门召开了筹备协调会议，并成立了筹备组。

2007年6月，国际二战史研究会副主席琼·博蒙特（Joan Beaumont）教授委托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前副校长埃里克·米铎斯（Mr. Eric Meadows）教授、何宝钢教授和国际交流部安妮·鲁宾（Anne Roubin）女士访问武汉大学，与我等人确定了会议有关事宜，并定于2008年4月14日至16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以“1931—1949 占领历史研究”为主题、以“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专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接着，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在京举行了正副会长会议，我通报了国际二战史研究会确定的会议方案，提出了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筹备会议的具体方案和措施。2007年8月，国际二战史研究会在

网站上正式公布了大会征文的信息，决定2007年10月截稿，2008年1月确定发言者名单。2007年9月，国际二战史研究会在网站上公布了国际会议征文信息。在国际二战史研究会和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共同努力下，最终确定了本次会议的名单。2008年2月，武汉大学向各位参会者寄送邀请函，办理与会手续。

2008年4月14日至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1—1949占领历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世界9个国家和中国的二战史专家及武汉大学师生代表计120人出席了会议。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向守志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刘源中将，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先生，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校长刘经南院士，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主席格哈德·赫尔施菲尔德教授、副主席琼·博蒙特教授、秘书长彼得·拉格鲁教授，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肖裕声少将等出席了研讨会。这是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会议，也是第一次在亚洲举办的学术会议，对于促进中国二战史学界与国际二战史学界的交流、对于中国二战史研究走向世界，无疑是一个里程碑。这部论文集便是这次会议宣读的论文，又经作者修订后汇集而成的。

编辑过程也是一个艰苦劳动过程。一是请作者将发言稿修改为论文。由于作者分散于世界各地，联络工作任务很重，加之作者修改文稿进度不一，前后经历了半年之久。二是中英文互译，由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边界研究院、历史学院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承担，他们学习任务繁重，难免进度不一。在会议期间及在论文集编辑的前期工作中，胡焰初教授、刘晓莉博士、熊晓煜、郁艳琴、赵伟等老师做了大量的琐碎工作；在后期编译工作中，胡焰初教授和关培凤、孔令杰、张帆博士，武汉大学出版社聂勇军、罗晓华两位编辑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畅所欲言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这部论文集收录的论文，各国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可谓百花齐放。其中有些论文的观点我们是不赞成的，但为了尊重作者，尊重学术，以及文责自负的惯例，在编辑时仍保持了原貌。

衷心祝愿这部论文集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界中外学者联系的桥梁与纽带。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胡德坤

2009年11月1日于武汉大学

总 目 录

中文部分	1
英文部分	197

中文部分

目 录

开幕式致辞

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主席 格哈德·赫尔施菲尔德	5
----------------------------------	---

（一）占领：定义、不同战区的性质、国际法中的地位

“二战”环境下的国际法与占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琼·博蒙特	9
希特勒的欧洲——1939—1945 年国家社会主义占领政策的几个方面	
希腊雅典大学 哈根·弗莱舍	16
占领区政府：两难困境下的法律和道德评价	✓
荷兰皇家科学院 彼得·罗梅恩	22

（二）占领对平民的影响

1940—1945 年德国对西欧经济的剥削

荷兰鹿特丹大学 海恩·克雷曼	31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难民问题的一般考察	
中国武汉大学 彭敦文 刘潇湘	56
中国慰安妇研究概要（1994—2007）	
中国首都师范大学 梁占军	69
盟国在柏林的住房政策与德国记忆叙述的产生（1945—1949）	
德国柏林理工大学 克娜拉·奥博勒	76
德国占领时期雅典的幸存者	
希腊雅典大学 尤吉尼亚·波诺娃	82

（三）占领对原政治当局、国民和抵抗运动合法性的影响

意大利对法国南部的占领统治

法国巴黎四大 戴安娜·格利叶	93
在中国被占领区的西方公民	
中国人民大学 李世安 李宏雷	98

占领对南斯拉夫和斯洛文尼亚前政治当局及民族抵抗运动合法性的影响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 波佐·黑培	108
占领德国：战后德国的四个盟国占领区（1945—1949）	
德国德累斯顿大学 海勒·波门金	113

（四）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的历史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肖裕声 付晓斌	127
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首都师范大学 徐 蓝	136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美战略合作	
中国武汉大学 韩永利 叶 静	143
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抵抗运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耿成宽 王景昌 李戈瑞	155
中国与联合国的成立	
中国武汉大学 刘晓莉	166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关系研究	
中国武汉大学 关培凤 胡德坤	17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化学战及战后遗弃化学武器问题	
中国武汉大学 胡德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 步 平	188
闭幕式致辞	
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主席 格哈德·赫尔施菲尔德	195

开幕式致辞

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主席 格哈德·赫尔施菲尔德

女士们、先生们：

我十分荣幸地代表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欢迎各位代表参加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国际二战史研究会、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以及著名的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举办。

我特别要向大家介绍几位值得感谢和尊敬的同事们，是他们将此次会议带到了武汉。第一位是胡德坤教授，前武汉大学副校长、现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以及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胡教授在三年前的国际二战史研究会悉尼会议上向我建议，并且一直支持在武汉举办本次会议。

我们同时还必须高度赞赏武汉大学中国边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胡焰初教授。他同各位与会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厌其烦地确认会议的各项事务，承担了会议筹备期间的重要工作。非常感谢您所做的重要贡献！

请允许我在此一并感谢来自国际学会执行处的同事们。特别是我们的副主席、澳大利亚研究会主席琼·博蒙特，她对中国深入的了解与热情的鼓励使得本次会议跨越了最初的障碍。我们的秘书长彼得·拉格鲁，他承担了本次会议学术部分的主要工作。我们在巴黎的执行处办公室秘书长加比·马克，他本人虽然不能与会，但他一直是我们的坚强支柱，我们必须感谢加比。

女士们、先生们，本次武汉会议是第二次中期会议。国际学会每五年举行一次例行会议，上次会议在悉尼举行，下次将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事实证明，国际学会有能力在五年一度的例行会议的间隔期间成功举办中期会议。我们筹办中期会议主要是因为我们国际史学会分配给我们的为期一天的会议安排感到难以满足。

同时，我们也希望有机会与各国委员会共同筹备我们的会议。我们上次中期会议是2002年与德国委员会在德国汉堡联合举办的，会议的主题是“二战”期间及战后的归家战俘，特别是亚洲战场的战俘。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汉堡会议是相当成功的，其成果也已经成书，由我们的同事鲍勃·摩尔编辑，已经在牛津的伯格出版社出版。

在此，我很荣幸能向我们的中国东道主，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胡德坤教授与名誉会长向守志上将和肖裕声少将赠送这本书。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1931—1949年期间的“占领研究”。我们认为该主题非常合适，这一方面是因为对此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例如，关于1939—1945年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大片欧洲地区的“希特勒的欧洲”研究；同时，毫无疑问，该主题也涉及日本

在 1931—1945 年期间对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占领。

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20 世纪 30—40 年代基本上处于成片领土，甚至是举国被外国军队占领和统治的国际秩序之下。这不可避免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亚大陆人民历史体验和记忆的重要部分，但是人们往往倾向于将这些记忆与占领以及其他多种统治形式相联系，而较少地与军事行动和相关事件等方面相关联。比如，日益困难的生活条件、不安定与无序、限制与强迫、强制措施和以武力相威胁的恣意妄为，这些都最终威胁到了人们的基本生存。占领的历史不仅构成了人们的记忆，而且还决定了战后的政治秩序：使某些政权合法化并维护其他政权，新的民族国家诞生，前殖民地独立，法西斯政体为共产主义或议会制度取代，民族或种族冲突激化。

正如我们最初在征集会议论文时所指出的，国际二战史研究会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占领的性质和影响。我们鼓励在最广泛的时空条件下对这些现象和事件进行研究。

组委会因此决定本次会议集中讨论以下四个主要议题：

国际法上的定义和地位；

平民的反应；

对前政治当局、国民和抵抗运动合法性的影响；

人民的强制搬迁。

综合各种因素，会议安排稍有变动（例如我们原计划的部分——难民、被迫动员——只有一篇论文），我们将其中两个议题合二为一。但是，我们也应当按原定计划展开全部的主题和部分，在内容和时间上也不会有任何限制。

此外，本次会议还特设了专题，由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组织和介绍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关情况。

我们大家都对本次会议满怀期待——期待可能都有点过高了。由于欧洲与中国之间距离遥远，有些参会者必须自己解决旅行费用，一些欧洲学者未能与会。我们的日本同行也因他们所在大学本周新学期开学无法到会——他们对此深感遗憾。

感谢大家克服漫长旅途和其他障碍，在此汇聚一堂。对一直期待着这一时刻的中国同行，我要说：“再次欢迎各位参加本次国际会议，您好。”

**（一） 占领：定义、不同战区的性质、
国际法中的地位**

“二战”环境下的国际法与占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琼·博蒙特

国际人道法，或者是人们所熟知的战争法，是一个脆弱的体系。国际法的各个部门都涉及国家主权的自愿放弃，而且其有效运作有赖于国家的自我管理与尚不发达的国际执行机构。国际人道法具有特殊的内在矛盾。它试图把非人道的矫正成人道的，给战争设定限制，而战争是一种典型的不受限制的行为；它还要使政府确保放弃一些可供他们使用的武器或者战争手段借以符合他们自己的重大国家利益。此外，过去 150 多年形成的国际人道法条约中的基本原则——在战争中造成的破坏与取得的军事收益之间应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区别合法与非法目标、避免“不必要的苦难”——都极具主观性而且难以界定。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人道法在平民保护上所做的努力胜过了任何其他领域。直到 1949 年，在经历了残酷的“二战”的摧残后，《日内瓦公约》这一主要的国际人权法律文件才将保护对象扩展到了平民。即便在当时，第四个《日内瓦公约》也只保护特定类型的平民：第一，敌对的外国人（这些人是指那些战争爆发后发现他们自身处在敌国领土上的人们）；第二，被占领土上的居民。第一个试图全面保护敌国境内的平民与本国境内的平民的法律文件直到 1977 年才诞生，那一年，国际社会签署了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

当他们的国家被占领时，平民通常身处险境。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当战争在亚洲和欧洲爆发时，有关占领的正式的法律尚不完备，这并不足为奇。传统上，有关占领的国际法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之上：第一个是占领并非兼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使用武力手段并不能分割主权，因此，占领应该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它始于冲突结束，终于战败国政府对其人民和领土恢复控制和管辖。第二，占领总是涉及占领者与被占领地区人民的权利之间的平衡问题，即所谓的交战国的权利与人权的平衡。通常（尽管不是总是）作为入侵者的占领军，他们有哪些权利、义务与适当的行为？通常作为违背其意愿被征服的平民们，他们又应当如何行事呢？这些问题一直是 20 世纪占领法争论的焦点。尤其是 20 世纪占领的方式已经不是 19 世纪的法学家们所想象的冲突后的临时政府，而且国际法所关注的重心也在很大程度上向个人的权利转移。

在吸收和借鉴习惯法与 1874 年的《布鲁塞尔宣言》的基础上，1899 年和 1907 年的海牙和平会议制定了 20 世纪初占领法的基本框架。政府和军事领袖密切关注的是交战国的权利，他们将在其控制的领土上提供有效的管理视为公理。正如 1907 年《海牙章程》的第 43 条所述：合法政权的权力实际上已转至占领者之手，占领者应尽力采取

一切措施,尽可能地恢复和确保公共秩序与安全,并且除非万不得已仍应尊重当地现行的法律。

但是19世纪末的军事领袖同时还想凭借这个模糊的条款,尽可能地以军事需要为依据为他们的军队保留最大的裁量权。因此,《海牙章程》关于占领的章节共包括14个条款,而其中的10个条款均涉及由占领者提供统治和管理。

海牙会议的与会者也丝毫不怀疑当占领者维持秩序时,被占领土的平民有义务服从管理,并给占领者提供积极的帮助。数个世纪以来,军人在行军过程中都是离开自己的国土生活,从占领的土地上征用物品与榨取捐税也被看作交战国的权利。

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征用和捐税的争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这里无需加以深入的探讨,但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海牙章程》,征用和捐税只能以满足占领军与管理被占领国所必需为目的。此外,征用的物品与捐税应与被占领国的资源相当,而不得强迫平民参加对抗他们自己国家的军事行动(第52条)。另外,公共与私人财产之间存在严格的区分(以21世纪的眼光来看这已经过时),而且只能征用国家的财产。传递信息的私人工具和交通工具及军火也可被征用,因为它们威胁到安全,但是应对此类征用在和平时期给予相应的恢复和补偿(第53条)。从被占领土平民收取的现金也应开具收条,以便有凭据在手,一般是由战后新成立的国家在占领结束后偿还给平民。

《海牙章程》中只有4个条款直接规定了平民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尊重“家庭荣誉和权利、个人的生命和私人财产以及宗教信仰和活动”(第46条)。平民不能够被强迫提供关于他们自己的军队或者国防系统的信息(第44条),也不得强迫他们宣誓效忠他们的敌国(第45条)。此外,掠夺和抢劫也被禁止(第47条)。

《海牙章程》规定的这些平民权利是以他们履行其在“占领条约”项下的义务及不挑战占领者的权威为条件的。但是,如果平民不愿意这样做呢?根据《海牙章程》,平民在遭到侵略与其国家被“有效占领”期间有权自发地拿起武器^①——即历史上的民众抵抗。但是,平民在占领者的统治完全建立起来后进行反抗的情形就更加复杂。他们是从事破坏活动者或刑事罪犯,并应受全面的刑事处罚吗?

这一争论的中心正是国际人道法的一个核心问题:谁拥有“战斗人员”的身份?另外,一支军队如何区分合法的敌军与不能享受国际法利益的非正规军?由于在海牙会议上倾向于保护交战国权利的力量强大,1907年的《海牙章程》(第1条)给战斗人员选择了一个传统定义:

战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不仅适用于军队,而且也适用于具备下列条件的民兵以及志愿军:

1. 由一个对部下负责的人指挥;
2. 拥有一个固定的、在远处就可识别的标志;
3. 公开携带武器;
4. 在作战中遵守战争法规和习惯。

^① Geoffrey Best. *Humanity in Warfare: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Armed Conflict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0. p. 183.

显而易见，这个定义并不能涵盖在 20 世纪的战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抵抗运动、自由战士和游击队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 1907 年海牙会议后 7 年内爆发，持续时间超过原定于 1915 年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海牙章程》在当代工业冲突环境下的不足很快凸显出来。事实上，由于《海牙章程》只有在所有交战国都是其缔约国时才能生效，所以此公约并未适用于 1914—1918 年的战争。但是，公约所反映的国际习惯法为所有交战国确立了相应的规则。

在战争中，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比利时、法国北部、塞尔维亚、俄属波兰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被同盟国占领，尽管它们声称受《海牙章程》约束，^① 德国事实上将被占领土上的农业、资本工厂、巨大的原材料储备（例如煤、钢、铁和谷物）作为残酷剥削的对象。如罗杰·切克因所言，被占领国家的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② 例如，在 1914 年 8 月尚在运营的 26 万家比利时工厂中，到战争结束时幸存下来的只有 3 013 家。^③ 此外，尽管关于德国在比利时暴行的报道被证明是夸大其词，但大约有 50 万比利时士兵和平民在四年的战争中死亡。当召集志愿者为德国工厂工作的号召并没有吸引足够的人数时，10 万多比利时人被强行驱逐到德国工厂工作。同样，大约有 60 万波兰工人被诱骗或强制向西搬迁。

这些与《海牙章程》中规定的征用和捐税均不相同。同盟国在 1914—1918 年间对欧洲的盘剥是为了其自身的战争需要，而且明显地超越了被占领国所能提供的资源。由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发起的国际食品救援活动帮助比利时避免了灾荒蔓延，而这场灾荒起源于德国的粮食控制。此外，德国人基本上不认为他们的占领是暂时性的。相反，他们计划在战后继续统治被占领土。例如，在俄属波兰与波罗的海沿岸，他们推行了重新安居计划，将德国人移居至当地原居民稀少的地区。

尽管《海牙章程》在“一战”中凸显不足并遭到违反，占领法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并未得到修改。在这 20 年期间，一系列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国际外交兴起，但变革者的精力集中在禁止战争和侵略，^④ 致力于普遍裁军，^⑤ 调整海上均势，^⑥

① For a useful account of the legal dimensions to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Belgium see Eyal Benevenisti.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Occup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2-46.

② Roger Chickering.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4.

③ Ibid., pp. 82ff.; Gerd Hardach.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 London: Allen Lane, 1977. p. 68.

④ For example, the Kellogg-Briand Pact of 1928.

⑤ A commitment to disarmament was included in 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most systematic attempt to implement this was the Disarmament Conference of 1932-1934.

⑥ Most notably the three treaties resulting from the 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 of 1921 to 1922 and the London Naval Conference of 1930.